



DUKU

读
库

0806



DUKU

读库

0806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0806/张立宪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225-629-3

I. 读… II. 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4412 号

读库 0806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5 × 925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29-3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42	丹青赋 王叔晖传略	蒋 力
43-94	王叔晖作品选	
95-127	今夜我们说相声	张 平
128-140	断章	北 岛
141-154	学子慕绥新	余昌民
155-209	暗地机关人不见 近代中国电报八卦	马伯庸
210-219	从 1986 年的窗口望出去	李 皖
220-251	八美千娇	顾文瑾
252-262	西晋灭吴	刘 勃
263-270	你好，末日	小 庄
271-317	声音	苗 炜 辑录

丹青赋

王叔晖传略

■ 蒋 力

将普及者提高 将提高者普及 善始善终真同道也
为红花之绿叶 为绿叶之红花 洁来洁去岂常人乎

——王叔晖挽联



一代画师王叔晖（张玉平摄于1982年）

1984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地处京城闹市王府井东侧的帅府园，与现在的望京新址相比，说是逼仄一点不为过。这年四月里的一天，美院建系时间最短的连环画系（后改为民间美术系，几年后取消）举办了一次别致的教学活动，活动内容是放映北京科影厂新近摄制的影片《王叔晖工笔人物画》。放映之前，当时的系副主任、主持该项活动的版画家杨先让教授讲了这样几句充满感情和敬意的话：

王叔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女画家，她的作品将载入美术史册。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她看着长大的。……一个画家形成风格容易，想在自己已有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创新是很难的，王叔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这一点。

在学生们的掌声中，王叔晖起身向大家致意。学生们发现，被杨教授如此推崇的画家竟是一个矮矮瘦瘦的小老太太。

与王叔晖先生共事多年的画家、后来成为国际艺苑假日酒店董事长的刘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归纳王叔晖留给他的印象：

我总觉得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女画家，要用几句话概括地说出来是不可能的。但她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却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里，这就是：她对于任何事都是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在王叔晖先生的追悼会上，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

将普及者提高 将提高者普及 善始善终真同道也

为红花之绿叶 为绿叶之红花 洁来洁去岂常人乎

联名敬献这副挽联的八位画家都是王叔晖的同事，他们是：姚奎、张广、徐淦、王里、许全群、徐希、林锴、江荧。

1988年，先生去世三周年忌日前，我填有《水龙吟》以作纪念，词曰：

一生毫素相陪，嫦娥寂寞图中见。银辉月涌，蝶飞梁祝，西厢轻叹。偏爱晴雯，木兰锐气，红楼唱晚。算巾帼英豪，古来无几，堪称是，知肝胆。

寄意千秋共此，写诗魂，男儿难辨。不须泼彩，凝眸处，风华尽染。未识闲愁，惜春当即，梦弦惊断。更无人续笔，临窗把盏，了东篱愿。

王叔晖，浙江绍兴人，生于1912年，病逝于1985年。她毕生孜孜以求，探索工笔画艺，作画题材以古代仕女为主，其作品计有连环画《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牌》、《杨门女将》及单幅人物画王昭

君、李清照、花木兰等，或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或为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个性的女性。晚年以《红楼梦》人物创作为主。其代表作《西厢记》所赢得的声誉远远超出了国界，她为我国工笔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叔晖先生晚年深居简出，闭门作画，极少应酬。关于她的身世、性格和从艺经历，见诸文字的材料并不多，已经刊布的文字中亦有疏漏或失实。笔者随先生左右二十余年，愿藉此文勾勒出她绘画生涯的一个轮廓，奉献给喜爱她作品的读者，亦慰先生在天之灵。

少年奇志

这是一家南方人，准确地说，祖籍为浙江绍兴。绍兴古称山阴，历史上孕育了难以计数的文化名人，但王叔晖却与绍兴无缘。清咸丰年间，一个王姓老头带着五个儿子离开绍兴北上，落脚京城。老头自己做玉工，儿子们的职业各有不同。大儿子在吏部当书吏，二儿子因故被老头打了一顿，从此不再姓王，改成了姓玉。据说最有出息的三儿子，十七岁就在玉蝶馆写字，专门负责黄绫裱折的誊写，字写得确实漂亮，也曾因这笔漂亮的字而飞黄腾达。四儿子在一金姓人家学徒，帮助主人捶金页子，一副金页子捶好，可得两个烧饼四两酱牛肉。其实最有出息的还是五儿子，他是王家几辈人中唯一开了洋荤的一个——远涉重洋，留学德国，与詹天佑同学，专学铁路建筑，回国后协助詹天佑，一起设计了著名的京张铁路。

民国初年，王家的三儿子和四儿子跑到天津，开办了天津第一座浴池——华园大澡堂，男部女部餐馆应有尽有，老三做了经理。次年，老四得一女儿，这就是王叔晖。从出生之日起，她在天津住了九年。

生不逢时，动荡的岁月在王叔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民国六年夏天，一场有史以来罕见的大水淹了天津城。那天她正在日租界内自己家的院子里玩儿，忽而发现，地上的砖缝滋滋地往外冒水。她觉得很有趣儿，找了几个煤球，蹲在那里塞砖缝。塞了这一处，水从另一处又冒出来，她忙不迭又去堵另一处，忽而发现几乎每条砖缝都在往外漏水了。这时，家里的厨师买菜回来，一见此状，夹起她就往屋里跑，径直奔上二

楼。到了楼上，从窗户往外探头一看，水已淹没了地面。三天以后，三大爷派来的一条船直接划到窗前，把她接走送到了华园。

也是在这年，王叔晖进了天津竞存小学，度过了她此生中仅有的为时两年半的学生生涯。

按规范的标准来要求，不能说王叔晖是一个好学生，但几十年后成为画家的她，却时常回忆起那段当学生的岁月。

教室里的第一排有一把红椅子，最后一排有一把黑椅子，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坐红椅子，成绩最差的坐黑椅子。王叔晖曾因成绩突出而坐上了红椅子，她发现坐这里离老师很近，于是就偷偷给老师画像。没想到被老师发觉，罚到最后一排坐黑椅子去了。

这期间，父亲很少问及她的学业，因为他在家的时候本来就不多。民国五年，他就任甘肃皮毛局局长，民国九年，应江西省长杨继高和督军陈光远之邀，任江西烟酒工业局局长，三大爷则当上了江西税务局局长。哥儿俩一起南下，也带上了王叔晖。把女儿带在身边，不过是略表一点亲情，其时，父亲已玩乐成性，又娶了一房年轻貌美的姨太太。他的官做了不到三年便被免职，随三哥来到北京。

到了京城，王叔晖没有因不能上学而感到痛苦，十二岁的孩子看重的不是课堂和老师，更愿意无拘无束地玩儿。经常在一起玩儿的是她的弟弟和两个叔伯兄弟，那两个兄弟喜欢京剧，其中一个作为票友，曾为京剧老生名角余叔岩操过琴。他们影响着小叔晖也爱上了京剧，以至于有一段时间里她见到有眼儿的东西就想吹，见到有弦儿的东西就想拉，甚而动了报考戏班子的念头。为此，她一人躲在家中后院独自练功，还挖了一个大坑，在腿上绑上了沙袋，从坑里往上跳。她幻想着将来能成为一个名角，也幻想着身轻如燕，出外劫富济贫。

家里的大人发现了她的动机，明确表示，不允许她去唱戏。那个练功的大坑也被填掉，彻底毁灭了她小小的心愿。

怕她外出淘气的大人，索性没收了她的鞋，给她剃了光头，让她在床上学女红。她困在床上，仅有的几本书翻来覆去地看，最后真可以倒背如流了。除了背书，她鼓捣个旧相机，竟学起照相来，对着人物和景物，她忽然想起了上学时的爱好：画画。于是，她看着窗外雪后的景致，饶有兴

趣地摹画起来。家里来了客人，她便在一边偷偷描摹客人的服饰。家里人看到她的画，都觉得画得还挺像。一日，有位客人发现了正在画画的她，仔细审视了一番她的“作品”，郑重地向她父母建议：送这孩子去学画吧，或许将来会有出息。

就这样，十五岁的王叔晖由二姐夫的弟弟、日后颇有名气的画家吴光宇介绍，进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入会时她带去的是一张临摹的作品。

中国画学研究会始建于1920年，是在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用日本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建的，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分别是金北楼和周肇祥，会址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东侧。王叔晖入会时，金北楼已逝，周先生升任会长。周肇祥，字养庵，清末举人，晚年担任北京古物研究所（现故宫博物院的一部分）所长，是京津画派的领袖人物。那时每个月有六次例会，届时，学员们带来画稿，请研究会的评议、讲师等先生们指教。周会长仗职务之便，时常从陈列所借出一些古画，让研究会的学员临摹。王叔晖从这时起开始看到一些历代名画珍品，并有幸带回家去认真临摹。

研究会汇集了身居京城的一批画家，众多文人聚于一处，切磋技艺者有之，相轻相蔑者亦有之，这种相轻相蔑对同辈中的佼佼者和后学者及女性尤甚。所幸，一位名叫孙诵昭的女画家对王叔晖格外赏识，才使她免遭更多的白眼。孙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读文史，亦通琴棋，曾在京城女子师范大学等数所高等学府任教，并在研究会任评议。解放后她任职于中央文史馆和北京画院，1968年去世，享年九十高龄。孙先生长于花卉和书法，但留下来的作品数量有限，我只见过各一，倒是所书内容给我印象更深：“虚室绝尘想，良晨入奇怀”，非凡人之语。

孙先生发现，这个小姑娘的功底不错，肯用功，便特意告诫王叔晖：书画同源，想画好画，须先练好字，多写斗方大字，腕力练到家，勾线才会流畅自如。王叔晖照此练去，笔下功夫出现了明显的长进。入会三年间，她几乎年年得到研究会颁发的奖品。周养庵会长看到她临摹的一张古代仕女画后，赞赏之余，特意在画上挥毫题道：“闺秀中近百年无此笔墨”，还聘请她担任了研究会的助教。后来广济寺大悲殿的三十二观音应真，皆由中国画学研究会出人绘制，周养庵所点的几个人中，唯一的

女性便是王叔晖。

短短三年，王叔晖从临摹入手，苦练基本功，继而开始尝试创作。三年之后，十八岁的王叔晖开始了以卖画谋生的独立生涯，严酷的环境逼着她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

卖画谋生

1930年，王叔晖的家境发生了骤然之变。父亲丢下一家人，携带姨太太和钱财一去不回，从此杳无音信。姐姐出嫁了，家里剩下三口人：母亲、弟弟和叔晖。她心里清楚，这个养家的重任非她莫属，除了画画卖画，她没有别的养家之道。学了三年多的一技之长，竟是这样实实在在地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

当时的卖画规则是这样的：各大南纸店（即现在的画店）都挂有画家的笔单，按尺标价。顾客看中哪位画家的作品，便与店方谈妥尺寸、内容、材料（或纸或绢）及取画时间，店里的伙计负责登门向画家通告，送上材料，然后再按约定时间来送钱取画。

但是，顾客买画是不会顾及画家忙闲的；于画家来说，时忙时闲则意味着时时劳忙。忙时，大多是凑巧应下了几张画的生意，一画起来，便无日夜之分。工笔仕女画常用的纸都是熟宣，渲染次数必须要多，谓之三矾九染。因为限期交画，所以王叔晖赶起画来就要几张画同时画，这张染过一遍就丢到一边，立刻染另一张，染完了马上铺开第三张纸……这么个画法，近乎于作坊式的作业，很难画出精品。但以一个不大出名的青年画家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来说，根本无法按个人意愿去创作，即使偶尔得闲，画一幅自己心爱的作品，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事。

一次，王叔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精心画了一幅四尺整纸的仙鹤图。画面上，两只白鹤起舞，朱膘染出彤云，石青罩染地子。这样的画，在专画工笔花鸟的画家笔下也是不多见的。画工笔的人都知道硬颜色（石青、石绿等）难染，大片罩染尤难保证效果，何况王叔晖并不是擅长花鸟的画家，这张画于她就更属罕见之作了。

画全部完成时，荣宝斋的伙计正巧来取别的画，王叔晖让他把这幅也带走挂到店里。伙计问：“标什么价？”王叔晖最后看了一眼这幅得意之作，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脱口而出：“标四十块大洋吧！”

伙计带上画走了，王叔晖顿感倦意袭上心头，她美美地睡了几个小时。醒后，心里仍想着那幅画，索性出了家门，直奔荣宝斋。到了店里，她未顾上和熟人打招呼，先转了一圈，想看看那画挂出来的效果。一圈转下来竟未见着，她转过头来问店主，店主笑眯眯地告诉她说：“卖了，上午一挂出来就卖出去了，买主根本就没还价。”

“哦？”王叔晖听了当然高兴，但也有点怅然若失的遗憾。

数十年后，笑谈往事，王叔晖说：“我解放前的生活，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穷、忙。生活所迫，想不穷就得忙，但忙了半天，也还是穷忙。”

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学会了抽烟，学会了熬夜。她的画案，那张伴随了她整个绘画生涯的棕黑色写字台，桌面的四周密密麻麻布满了香烟熏过的痕迹。她的习惯是画画离不开抽烟，烟点着了，顾不上抽时就放在一边任其燃到头，有时则是她太累了，点着烟没顾上抽就睡着了。

1939年，王叔晖的母亲患肺病去世，死时还不到六十岁。她的心境受到极大影响，烟也抽得更凶了。但她断然没有想到去依赖别人，她给自己订下的生活信条是：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卖画收入不能完全解决温饱，作画之余她开始收徒授课。学生们的家境比起先生来大都稍好些，除了必交的学费之外，有时她们眼看先生的日子见紧，最窘困的时候一根胡萝卜就是一天的伙食，便不约而同地略尽一点心意，这个送来一棵白菜、那个带来一袋煤，另一个还会把先生接到家去吃顿饭。

1940年夏天，王叔晖携学生数人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举办了一个画展。这是她第一次举办画展，这里也是她正式学画的地方，因此她对这个公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直到晚年，为画《红楼梦》人物组画而做准备时，她还带着我来过这里，写生、拍照、搜集素材。

画展的名称是“消暑雅集”，吴光宇先生题写。既然是师生画展，所有学生就都有作品参展。王叔晖明确规定，不为展览的事情请客花钱登报，卖画所得归为个人，作为先生，她一概不提成。



王叔晖先生二十八岁时留影，摄于惠君绘画传习所。
(照片由王维澄提供)

此后，“消暑雅集”每年举办一次，持续办到1948年。最后这次时近北平解放，城内已是兵荒马乱。王先生估计，有心思看画买画的人已不会太多，就独出心裁，办了个扇面画展。扇面画小而别致，易展易销，买的人也不算少，最后一算，各项开支居然马马虎虎都对付过去了。观众中，有一个与王叔晖关系比较特殊的中年妇女，买了两幅扇面。她的光临，有两层原因，一则她是王叔晖的房东；二呢，那年参加画展的几个学生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她的孙女杨忠平（后来成为我的母亲）。

四十年代的王叔晖，三十多岁，小有名气，且未成家，自然引人注意、猜测，甚至图谋不轨。时常光顾房东杨家的一位女律师，偶尔也到王叔晖的屋里来闲聊几句。一次，她诡秘地对王叔晖说：“你为什么不去上海开画展？我在那边有关系，可以给你帮忙的。不过，就凭你和你那些女弟子，甭管画得好赖，往那里一站，还愁卖不出画去？”话未说完，女律师已吃吃地笑了起来。王叔晖看着她不怀好意的神态，明白了她话中的意思，冷冷地答了一句：“对不起！您记住，我王叔晖卖艺不卖人！”

多年以后，我与叔晖先生有机会聊天时，她多次讲到这件事。从中，

我明白了，一个以混迹于官场为能事的女人，是不会理解同为女性却是在挣扎和奋斗中努力探求艺术的另一颗心的。

或许，在某一瞬间，神圣的艺术倒会令一个通此灵犀的侵略者苏醒良知。

临近抗战胜利的一天，已是黄昏，王叔晖仍在灯下伏案赶画儿。忽然，院子的大门被敲得山响，还夹杂着生硬的吆喝声。王叔晖赶紧出门，直奔北屋窗下。房东杨家也已惊醒，却不敢点灯。杨太太声音颤颤地说：“你去问问怎么回事吧。”王叔晖战战兢兢开了院门，一下子拥进来四五个人，嚷着查户口，径直闯进了唯一亮着灯的王叔晖的小屋。王叔晖跟在后面，不知凶吉。先她进屋的狗腿子模样的人已迅速检查了一遍室内的陈设，见桌上、床上、墙上、地上到处都是画，便稍微放松了些敌意。为首的一个日本军官毫不客气地抄起桌上的香烟，给自己燃着一支后，半晌没有说话。他将各处的画一一看过后，回过头来审视着站在门口的王叔晖问道：“这些，都是你画的？”

王叔晖的心还在怦怦乱跳。她点点头。

那日本军官朝她招招手，示意让她进屋。王叔晖动了一下身子，脚下却没有挪窝。

日本人又看了会儿画，语气和善了一些：“你的，画画的，画得漂亮。我的，也是画画的。干这个，不愿意，没办法的……接着画吧。走！”

他一抬手，一应人等随即出屋，查户口的事只字未提。

锁好院门，王叔晖才发现身上的小褂儿已被冷汗浸湿了。她隔着窗户，和北屋的主人招呼了一声“人都走了，您安心睡吧”之后，两腿软软地走进自己的小屋，一坐下就先点了支烟，心里说了两个字：“万幸！”

风雨如晦，卖画维生二十年，作画当以千计，而手头除了画稿，王叔晖几乎一张画也没留下。三十年后的七十年代，笔者在北京琉璃厂东街的一家画店里见到一张标价四百元的王叔晖的工笔仕女画，显然是解放前的旧作。从画面上看，线条的秀中有力、设色的鲜而不艳等一以贯之的风格，已经初见端倪，而人物的造型和神态与她此时的作品相比，却完全无法同日而语了。1982年，王叔晖接受《连环画论丛》副主编曹作锐的采访时说：“解放前，我画了二十多年，不论什么扇画、条屏、中堂、百子图、百

美图都画，大约画了有一千多张。但是，好作品并不多，因为那时我来不及仔细推敲，我要赶时间，要多画。我靠卖画养家，靠卖画给母亲治病，不多画就揭不开锅。只有到解放后，我的艺术创作道路才算是真正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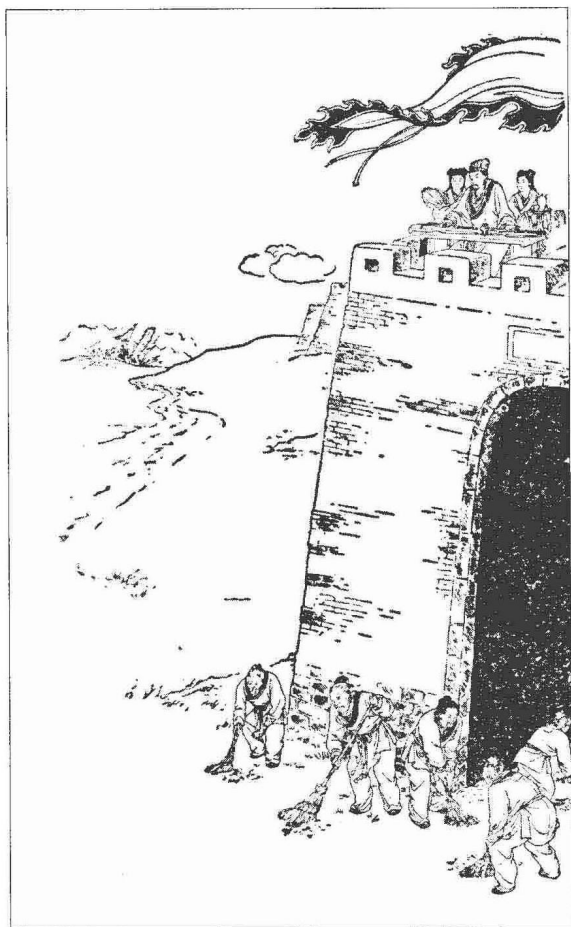
发愤中年

解放之后，王叔晖通过考试，进入出版总署参加工作，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小学课本画插图、地图（后来又为中学课本画过插图）。不久，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她即到该社工作。那时的出版社，没有专职画家，创作室的成立，也是后来的事。文革前的王叔晖，除了连环画、年画为主的创作之外，还搞了很多书籍的装帧设计。1950年，中国为斯大林祝寿而送去的礼品中，有一本纪念册，就是王叔晖的美术设计。刘少奇的著作《论党》，也是她做的封面设计。那之前她还不会写美术字，都是边学边干，进步飞快。《杨柳青年画参考资料》一书的设计，获得了1958年莱比锡书籍



王叔晖先生工作照，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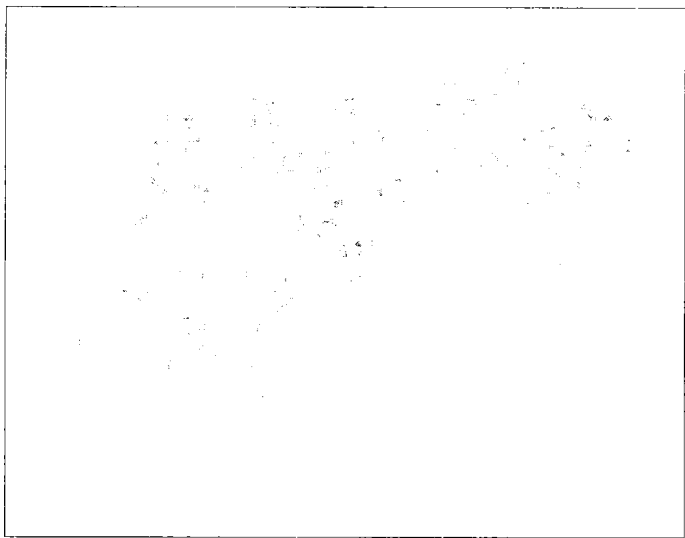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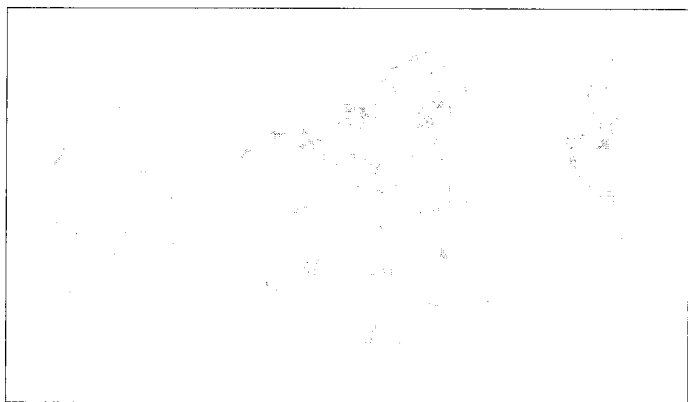
（照片由王维澄提供）



《失街亭》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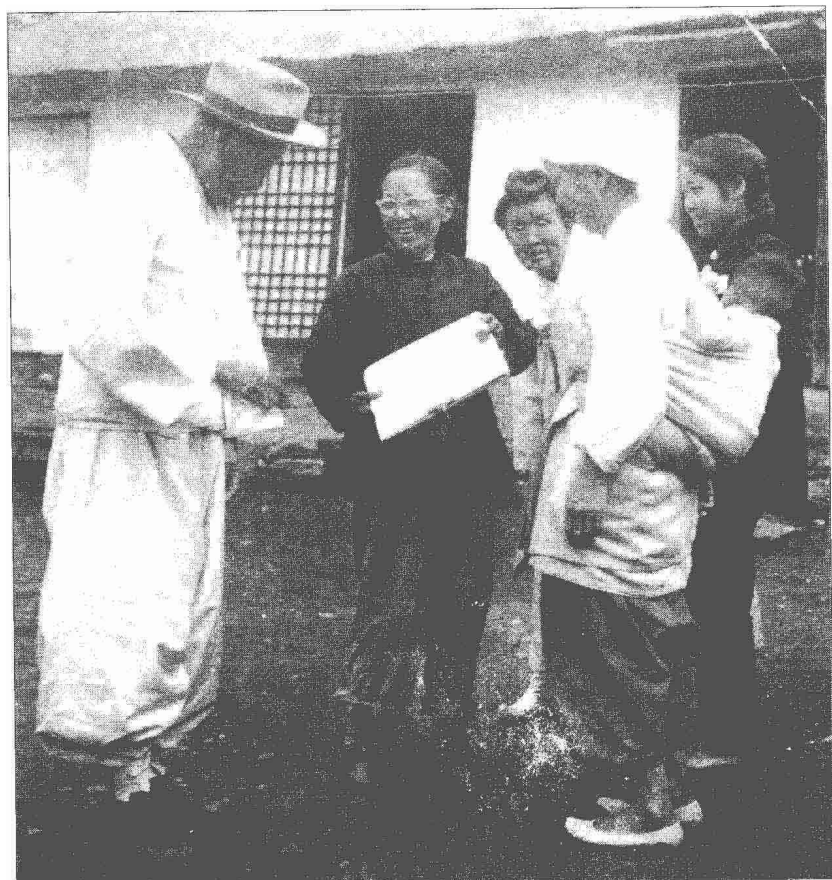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展览的银奖。

王叔晖深知自己的底子薄，就利用空闲时间抓紧学习，首先是补上了人体写生、素描、解剖、透视等专业课程，其次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一套《鲁迅全集》，她是借出来读完的，读这套书的大部分时间，竟是她每天早晨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研墨的同时。出版社仅有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几乎没人借过，她发现之后如获至宝，借来后不仅通读，而且做了大量笔记和临摹。这些资料，在她日后继续从事的古代题材的创作中，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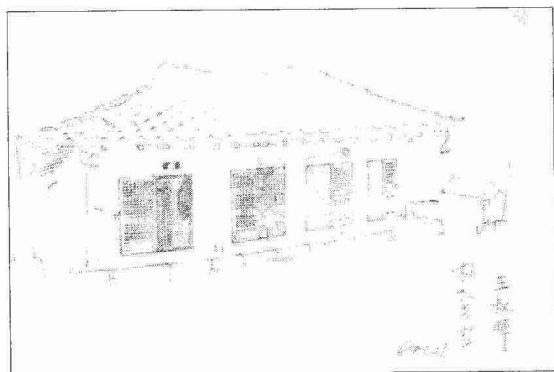


王叔晖先生手绘的创作素材。

十几年里，她的连环画创作数量最大。除了两部《西厢记》之外，她的连环画创作已出版的还有：《孟姜女》、《木兰从军》（1950年），《河伯娶妇》（解放初），《墨子救宋》、《朝鲜儿女》（1951年），《发扬工人阶级高贵品质的高凤举》（1952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1954年），《桑园会》、《马郎和三姑娘》（1956年），《车允好学》（小型折叠式连环画，1959年），《生死牌》（1962年），《杨门女将》（1964年）等。1951年《连环画报》创刊后，她还为该刊多次创作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连环画。她



1964年，王叔晖先生赴延边体验生活，与当地群众交流。（照片由王维澄提供）



在延边创作的速写手稿。